清代珠江三角洲康公傳說的流變

石秀峰

文章提要

康公，在珠江三角洲地區又叫康王、康真君、康主帥、康元帥，在文獻和鄉民的口述中一般稱其為“康公”。為了行文方便，本文一般情況使用“康公”一詞，在引用文獻或相關研究時，為了與原文對應，則保留與引文一致的表述。

已有的研究表明關於康公的傳說各種各樣，並沒有統一的原型，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並非要探討康公是如何進入珠江三角洲，或者其分佈狀況等。我們要考慮的是同樣被稱為“康公”的神在不同的地域社會與不同的人群中具有什麼樣的意義。因此，本文選取珠江三角洲作為研究地域，通過文獻分析與田野調查相結合的方法，考察自清代以來，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與地方社會的變遷，康公傳說的不同變化。被稱為“康公”的神，儘管它們有著看似一樣的名字，但是可能有不一樣的來源、不一樣的身份和不一樣的職能，深究下去甚至可能會發現它們中的一些本來並不叫“康公”。總之，不同的地方社會賦予了康公不同的內容，從這個意義上說，統一的康公神是不存在的。但這些差別又在某種敘述中具有統一性，為什麼會有這種統一性？它又是如何形成的？這些也是本文試圖回應的問題。

明清時期，康公並不是被納入正統的祀典神明，卻在珠江三角洲地區受到廣泛崇祀，直到現在這種信仰依然盛行。今天，珠江三角洲的村落都流傳著幾乎一致的康公傳說，人們認為他們所祭祀的康公是宋代大將康保裔。在他們的敘述

中，康保裔在抗擊敵人中英勇犧牲，老百姓為了褒獎其忠義紛紛拜祭他。那麼，清代的文獻又是如何描述這位康公的呢？清代方志和康公廟碑刻等文獻並沒有明確介紹這位神祇到底誰，但是從“元帥”、“真君”、“地祇”等表述來看，康公似乎偏向於道教一類神明，而不是現在所說的康保裔。

從碑刻和方志等材料入手，我們發現清代鄉民之所以崇祀康公，主要是因為其靈驗，而不是忠義。不管是在禦敵消災方面，還是庇佑商業發展方面，鄉民都強調康公的靈驗。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各個村落流傳的傳說並是不一樣的。這些傳說具有非常濃厚的地方特色，能讓我們看到康公信仰之於當地社會發展所具有的意義，這是康保裔版本的故事所不能反映的。至此，我們需要考察一下村民口中康保裔版本的傳說是如何形成的，村民為何選擇這個傳說，而“拋棄”了具有本土意義的傳說呢？同治時期，一位元廣州代理知府在其著作中提到廣東此前已經出現了康保裔的奉祀。但是直到光緒時期，關於康公傳說仍然不見有與康保裔相關的記載。當時的報紙記載彼時普遍流行的是一個忌食鴨類食物的傳說，據說因為鴨子曾經救了康公，所以吃了鴨類食物進廟，會受到康公的懲罰。老百姓廣泛流傳這一傳說，並視其為康公靈驗的一個證明，這個靈驗故事與碑刻和方志上的傳說都不相同。到了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在地方文史工作者的文章中開始出現了將“康公”說成是康保裔的敘述。這樣看來，康保裔版本的康公傳說很可能是民國以後才開始流行的。直到現在，許多珠江三角洲的康公傳說都強調康公即是康保裔，而用“食鴨類食物入廟會遭懲罰”的傳說來說明康公的靈驗。村民採用康保裔的傳說更多的是為了強調神明的正統性，這一點可以從他們反復強調康公的忠義看出。有研究者指出，“對於神明的歷史與認知是‘正統’的歷史

敘述，加上所接受的地方性或者是儒家之外的論述而成的。”[1]然而，當各地的康公傳說都講述成康保裔的故事時，我們發現它對於地方社會的歷史變遷與社區建構絲毫沒有意義。對康公的理解，一旦“抽離”了地方社會這個舞臺，各地的傳說都只是在重複康保裔顯靈的故事，這樣它就失去了地方特色，不再具有本土意義。因此，我們需要深入地方社會去瞭解康公，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看到神明信仰之於地方社會歷史發展的意義，也能更好地理解當地民眾信仰此神靈的原因所在。

本文試圖通過兩個個案來考察清代以來鄉村聚落中的康公傳說及其在地方社會中的意義。第一個案是番禺鐘村。鐘村是位於番禺西北部的一個雜姓村落，清代以來附近村落的大族聯合成一個地域聯盟，而這個聯盟的中心就是聖堂——康公廟。清代後期，隨著鐘村榨油業的興旺和市場的繁榮，我們看到了當地的大族，同時也是控制市場的主要勢力，他們又復興了康公的奉祀。至清末，當地大族成立一個專門負責巡遊的會——三益會，由聚落內的十甲每年輪值一次。三益會的倡建是當地商人實力的體現，同時也是當地經濟發展後，民眾對康公信仰活動熱衷的表現。從當地流傳的傳說來看，康公巡遊的意義更主要的是整合清代以來墟市附近的大宗族。每逢康公巡遊，都要到 2 裡以外的漢溪進行巡遊，據說這是因為康公要回它媽媽的娘家探親。這樣的傳說就能很好地說明為什麼鐘村會形成以墟市為中心的多姓氏社會。第二個案例是增城東洲村。這個村落在明代就已經聚集多個宗族，在這個宗族關係緊張的村落中，村民形成了以康公為中心的地緣組織。明代以來，村民就開始以康公的名義控制和開發沙田，將所得收益用於地方事務中。到了康熙年間，白米場沙田坦腳又有增長，由於新沙沒有收益，所

[1] 范纯武：《双忠崇祀与中国民间信仰》，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3 年。

以村民不得不商議通過籌款投資來應對康公巡遊。在這一過程中，作為當地大族的鐘姓無疑起到了很關鍵的作用，而地方官可能出於維護地方穩定的原因也支持他們的祭祀活動。“白米場”沙田的發展帶動了商品性農業的發展，使東洲在乾嘉時期出現了一個墟市，這個墟市的控制和管理當然離不開當地的大族，特別是鐘姓。以康王名義開發、管理土地的活動一直在繼續，東洲村民利用土地收益進行康王信仰活動也持續到解放初。

關於珠江三角洲地區康公一神的材料主要集中在方志和碑刻中。其中碑刻材料得益於近年來政府對文物保護工作的重視，許多碑刻得到了保護與搶救，以廣州地區最為明顯。2008 年廣州市整理出版的 14 本《廣州市文物普查彙編》，《彙編》不但記錄了康公廟在廣州各個區的分佈情況，更將當地廟宇留有的碑刻做了統計、整理。此外，一些學者的碑刻整理工作也為筆者提供了便利，如譚棣華的《廣東碑刻集》和冼劍民、陳鴻鈞編著的《廣州碑刻集》。除此之外，筆者還多次深入田野，在鄉間抄錄了本文所用的絕大多數碑刻材料。民國的期刊報紙也記錄了一些當時珠江三角洲的康公信仰習俗，這些報導可以作為清代方志與碑刻的延續，讓我們看到康公信仰在民國時的變化。解放以後的地方文史工作者整理的文史資料也是重要材料。他們或親身經歷，或親訪耆老，將所見所聞轉為文史資料，成為重要歷史的再現。此外，還有各個村鎮出版的地方性書籍，這些書籍承載了地方民眾對家鄉歷史的記憶，對我們研究當地歷史大有裨益。最後，筆者在珠江三角洲地區進行了多次田野調查，走訪了眾多鄉村耆老，他們的記憶與對鄉村社會的理解給了筆者很大的幫助，這些珍貴的口述材料也會作為本文的材料。